

# 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

李建中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内容简介

清理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旨在为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提供一种新的入思方式。

书名：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

作者：李建中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16-04325-1/1206.2

出版日期：2005年7月

印张：10 开本：32

定价：24.00元



# 目 录

## 一 诗性传统

诗性传统的断裂.....	3
原始思维与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 .....	14
儒道释文化与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 .....	28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周易》与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 .....	43
谁其尸之,神理而已	
——《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59

## 二 言说方式

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	75
从寄生到弥漫	
——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原生态考察 .....	81
辨体明性	
——古代文论的破“体”式言说 .....	93
思之诗	
——古代文论的隐喻式生成.....	109
《二十四诗品》:古代文论的诗眼画境 .....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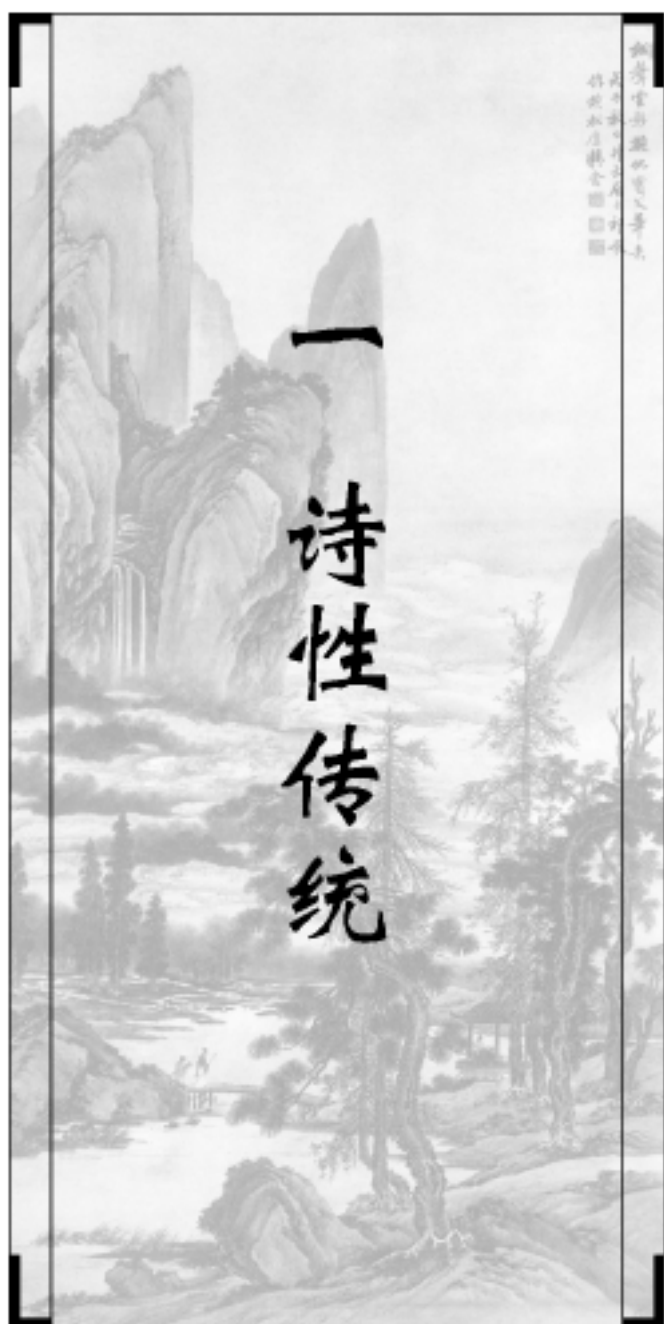


### 三 人格精神

人格精神的儒道分野.....	133
断裂与重铸	
——汉魏之交的人格精神与文学理论.....	148
虚静与躁动	
——魏晋人格精神的审美观照.....	191
演进与终结	
——魏晋儒家人格的玄学化历程.....	207
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	224

### 四 文化价值

反(返)者道之动	
——古代文论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239
神女与寡妇	
——魏晋文学女性形象之文化批评.....	255
任自然与务折衷	
——刘勰文学思想之文化考量.....	268
魏晋思想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283
文学理论建构的本土文化资源.....	300
后 记.....	314





## 诗性传统的断裂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本土性资源或地方性知识。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者面前:我们拿什么去和西方对话?毋庸讳言,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都在过于专注地步趋西方(包括苏俄和日本)而无暇顾及自身的文化及文论传统,以致于当我们在后轴心时代的文化交往中不得不提供本土资源时,我们只能别无选择地回到传统,回到中国传统文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论的诗性特征。

—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自己的特色。

从逻辑上讲,中国文论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或规范这一历程的更久远更强大的文化传统,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美学内涵和语言—文学外观——这一切,足以构成上述“逻辑”的内在支撑。

然而,20 世纪的“历史”,同“逻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有学者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论的特征表述为“他律”超越“自律”,这里的“他”是指外在于文学的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



等。若作一点引申,则“他律”之“他”还可以指称中国之外(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哲学和文论。正是在双重“他律”的制约之下,20世纪的中国文论走上了一条“渐失自我”(逐渐丢失自身特点)的世纪之路。后一层意义上的“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所指:20世纪20、30年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达尔文的进化论,丹纳的“民族、时代、环境”三要素,戈蒂叶的“为艺术而艺术”,尼采的悲剧哲学;50、60年代是前苏联高度政治化、哲学化的文艺学教科书,是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马林科夫;80、90年代是从萨特到萨义德、从现代到后现代、从结构到解构的各种版本各种“主义”的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

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百年史有过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五四”时期由“传统”而“现代”,一次是新时期由“封闭”而“开放”。两次转型都是得力于“他律”,得力于异域文化的“熏蒸刺提”。这一历史事实的蕴涵是多重的:既揭示出西方思想文化对于中国文论的决定性意义,同时也显露出中国文论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高度依赖。走到世纪的转折点上,人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简单事实:中国的文学理论,不仅其演变历程为西方思想文化所规范,而且其理论体系、思维模式、文论话语都是西方文论所提供的。在20世纪西方文化的巨大阴影之中,中国文论的“自我”被消溶掉了。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人们想到了中国古代文论,想到“不论今后中国文论向何处去,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魅力是永恒的,它将越来越被中国现代的文论所借鉴所吸纳,是毫无疑问的。”

但问题在于,当我们继承、借鉴、吸纳古代文论传统的时候,又习惯性地走上“他律”之路。90年代后期,“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

童庆炳、陈雪虎:《百年中国文学理论之省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2)。

是诸多学术研讨会和诸多学术期刊的热门话题,而发言者谈得最多的,是如何使诗性的、感悟的、散步式的古代文论变得理性、系统和谨严。显然,支撑这一思路的,是欧洲大陆几百年来的理性主义传统。

百年中国文论“丢失自我”的世纪性困境,激发起学界对古代文论的学术热情;而学界在对文论传统进行基本评价之时,又情不自禁地拿来西方理性主义的标尺。这里有一个悖论或误区:一方面是要借助古代文论来恢复已被西方文论所消溶了的“自我”,另一方面则是在评价或转换文论传统时因固守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而重新丢失了“自我”。

诚然,西方的理性主义是人类文明走出中世纪愚昧的明灯。曾在五四运动中受“德”、“赛”二先生之启蒙的中国人,对这一点自然是感受尤深。但是,若站在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平台上反思理性主义的传统,则不难见出它的种种缺憾,至少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来说,理性主义不是普适的、万能的。现代西方哲学、美学中的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正是试图解构欧洲大陆几百年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建构一种与中国老庄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相通的“诗化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曾接触过中国道教和中国禅宗的思想,40年代中期在中国学者萧师毅的帮助下研读过五千言的《老子》。海德格尔在评论荷尔德林诗作时提出“人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与中国文化和文论的诗性传统有契合之处。

至此,笔者所述之问题的关键已经凸现:中国文论要走出“他律”之困境则须借鉴古代文论的传统,而要有效地吸纳文论传统则须大胆质疑“西方理性主义”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全面清理并重新

---

参见成穷、余虹、作虹译:《海德格尔诗学文集》,191~208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评价中国文学理论的诗性传统。这或许是中国文论走出世纪困境的可行性路径之一。

## 二

中国文学理论自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诗性传统。

何为“诗性”？日常话语中的“诗性”，狭义地讲是指“诗歌的特性”，广义地说是指与逻辑性相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而学理意义上的“诗性”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语出维柯《新科学》，特指原始人类在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等方面的特性。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国古代文论，大体上在三个层面显露出鲜明的诗性特征：作为语言方式的文学性和抒情性，作为思维方式的直觉性与整体性，作为生存方式的诗意化与个性化。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语言方式是“文学”而非“理论”的。且不说论诗之诗、论文之赋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也不说历朝历代的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无处不洋溢着诗的智慧与激情，即便是最具理论形态和思辨特色的《文心雕龙》，其言说方式也是诗性的。彦和论“神思”则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说“风骨”则曰“若风骨乏采，则鹜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谈“物色”则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这是文论，这又是诗，亦诗亦论，论在诗中。

与古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家相比，中国古代文论家既缺少一种对“理论家”身份的自我确认，也缺少一种理论意识的自觉。而正是这些“缺少”成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铸成了古文论的诗性外观。作为中国文论之滥觞的先秦文论，孔子文论的语录体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和虚灵化，以及《诗三百》之中有着文论思

想的诗句,都为后来的中国文论奠定了一个诗性言说的基调。刘勰钟嵘的时代是中国文论的鼎盛期,《文心雕龙》“纲领明”、“毛目显”的理论体系并不能遮蔽其贯穿首尾的诗人激情,而“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辨方法亦无法取代“骈文”这一文学样式所具有的艺术的审美的语言魅力。《诗品》则以其“骋情”和“寓目辄书”的语言风格,以其“意象评点”的言说方法,开中国文论中最具诗性特征的文本形式(诗话)之先,以至成为中国诗性文论的典范性文本。六朝以降,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已稳固地形成,这不仅表现在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以及论诗诗成为古文论的主要文本形式,更表现在古文论形成了一整套独具诗性精神的范畴和术语,如神思、情采、体性、风骨、兴寄、气象,以及滋味说、意象说、取境说、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

语言是思想的形式,是思维方式的文本化。中国古代文论家以诗的方式言说,是因为他们以诗的方式思维。钟嵘品诗,反对用典而推崇直寻,《诗品》卷上评谢灵运“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兴多,指思维不离形象;寓目辄书,指思维的直接迅速;内、外云云,则指思维过程中的主客契合。直觉思维,本来是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而我们读《诗品》,可以见出钟嵘的诗歌评论,其思维方式也是直觉性的。面对自己的批评对象,钟嵘也是“寓目辄书”,或比较或比喻或知人论事或形象喻示,均为诗性言说而并无理性分析。比如评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两个比喻加两个形容词,“用自己创造的新的‘批评形象’沟通原来的‘诗歌形象’”,使人读后“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领悟,感受到甚至比定性分析更清晰的内容。”

---

参见李建中:《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206~21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

曹旭:《诗品研究》,1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其实,钟嵘的这段品语本身就是一首很美的诗。说到底,在钟嵘那里,写诗与评诗是没有区别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是没有区别的。“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是“诗”的言说也是“论”的言说,既有诗的激越奔放也有论的锐利准确。它们是直觉思维的产物,其间又蕴涵着将创作、批评视为一体的“整体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与整体的思维方式,在宋代严羽的诗论中表现得更为显明。严沧浪以禅喻诗而独标“妙悟”与“兴趣”,其思维特征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这是将以直觉思维为根本特征的禅心禅意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另一方面,严羽的妙悟说和兴趣说整体性地共适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沧浪诗话》讲“悟”之等级,讲“悟”之前的“熟参”之顺序,既是指诗歌创作者的心理特征,同时也指诗歌鉴赏及批评者的心理特征;而严羽推崇备至的“入神”,作为一种“诗之极致”、“蔑以加矣”的最高境界,显然是诗歌的创作者和鉴赏批评者都渴望进入的。

禅,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或者说是二者的统一,参禅者通过直觉式的妙悟去体验那个形而上的终极境界,进入一种诗意的此在。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论与禅是相通的。文论家品诗论文,其意并不在诗亦非在文,而在于这种诗意化和个性化的生存方式。中国古代并没有职业的文学理论家,甚至也没有职业的文学家,士大夫们常常要靠“文学”和“文论”之外的行当来谋生,但他们却真切地生存在“文学”和“文论”之中!“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我以为《文心雕龙》这最末的两句话,也是最要紧的两句话。刘勰的栖息之处,并不在桑门也不在庙堂,而是在“文雅之场”在“藻绘之府”,在“神与物游”之中在“心物赠答”之际。“逢人

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是此家”,诗之舟是心灵的栖息,是精神的家园。

诗意化的生存是个性化的生存,是对个体生存方式的人格承担。司空图用四言诗写成的《二十四诗品》,如诗如画地描绘出二十四种诗歌风格,比如《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日可读。”这是诗的风格,也是人的风度和人格,我们分明看见一位有“典雅”之风的“佳士”,赏雨于竹林茅屋而品酒以玉壶,横琴于飞瀑之下而目送幽鸟落花。“落花无言”是佳士的心境,“人淡如菊”是佳士的人品。司空图为我们展示的这幅“人境双清”的图画,是“典雅”之诗风的人格化,因而也是“典雅”之士的人格写照。意境的人格化与人格的意境化,诗意般地铸成“佳士”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和人格形象。甚至可以说,二十四种诗风就是二十四种意境、二十四种人格形象、二十四种个性化的生存,如《高古》中“手把芙蓉”的“畸人”,《自然》中“过雨采苹”的“幽人”,《沉著》中的“脱巾独步”之客,《豪放》中的“真力弥漫”之士……司空图论诗,最讲究“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我以为,对于古代文论家来说,诗歌韵味之外的至永之旨趣,就是个体诗意化的生存。

### 三

中国文论诗性传统的现代价值何在?

谈起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我以为当今学界存有两大误区:一

---

陆游:《鹧鸪天》。

个是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价值取向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另一个是价值确认中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就后者而言,学界讨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讲得最多的是如何将古文论中的那些范畴、概念、术语“古为今用”,前两年炒得很热的“失语症”、“话语转换”等等,其基本思路也是工具性或功利性的。王国维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同样可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论”;而前时代之文学和文论对后时代之文学和文论,又不能不发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或主要不是)发生在操作的或实用的层面,而是发生在诸如文化心态、美学趣味、艺术精神、人格理想等深潜的层次。20世纪的中国已很少再有人填词、写格律诗或写章回小说,但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意境、人格精神和文化内蕴却为当今真正的文学家和文学创作所吸纳所承续。“不用之用”才是最大的“用”,中国文学的这种古今关系对于中国文学理论具有极大的启迪性。已有学者指出,古代文论的研究不能汲汲于“用”,而应从根本做起,“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而言,传统文化之根基和素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涵就是她的诗性。且不说道家的自然与超迈、道教的神秘与浪漫、玄学的清虚与冲淡以及禅宗的般若、顿悟等等,本身就是典型的诗性文化,即便是以“事功”见长的儒家文化,其实也并不乏诗性特征。孔子忧道传道,热心救世,却也神往于沂浴之乐,醉心于韶音之美。海德格尔曾不厌其细地解读荷尔德林的两

---

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3)。

句诗：“人们建功立业，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借这两句诗来状写《论语》中的孔子也是颇能传其神的。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学理论，铸成其诗性内质便不足为奇了。

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的人们，也在“建功立业”，却并不能够“诗意地栖居”。文学这片本该是最富诗意的绿洲，却在遭受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侵袭。刚刚摆脱“政治奴婢”之地位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一转身又要去做金钱的臣妾。文学批评的主体与对象，已沦为甲方与乙方，没有了人格，更远离诗性。对于这种后工业时代的流行病，我以为，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无疑是一剂良药。

工具主义与科学主义是相生相伴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人们对工具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工具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导引着现代人愈来愈远地背离个性化和诗意化的生存。科学是万能的，因而理性也是万能的，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包括文学和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热躁一时的“新方法论”，正是上述思维方式的产物。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这些自然科学的方法被“拉郎配”式地引进文学理论，结果怎么样呢？没几年便“尔曹身与名俱灭”了。

我并不是一概反对文学理论中的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而是反对那种科学化倾向，反对那种理性唯一、科学至上的态度（这种倾向或态度本身就是“非科学”的）。“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对文心的探幽索微，对文学的深识鉴奥，更多的是一种描述（discribe）而非仅仅是规定（prescribe）。文学理论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理应建立在她自己的诗性传统之

---

成穷、余虹、作虹译：《海德格尔诗学文集》，191～208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黄庭坚：《寄晁之忠》。

上。

对于中国文论来说,诗性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终究要凭藉诗性的语言方式呈现于外。陆机以赋论文,刘勰以骈文析文心雕文龙,杜甫以七绝论诗,司空图以四言描述诗歌风格和意境……虽然有“时序”、“世情”之因,但更多的是深受诗性文化熏染之人对诗性言说方式的自觉选择。反过来说,非诗意的栖居和唯理性的思维,往往导致文论话语的艰涩、干涸和板滞。文学批评常常远离文学作品,在一个丢失了上下文的虚空之中,毫无目标地抛掷新术语新名词的炸弹。文学理论则是无视本民族的文化语境,热衷于为各种进口的“主义”或“流派”做着似是而非的诠释;或者似懂非懂地盯着外来的文论“蓝图”,随心所欲地搬动着本民族的文论“部件”而建构着沙滩上的理论“大厦”。这种“大厦”既缺乏内在的精神支撑,更没有外观上的“好看”(诗性的言说)。

中国文学理论要走出世纪困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必须承续自己的传统——这一点,已经成为文论界的共识;但是,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诗性传统,文论界既缺乏起码的重视,更谈不上全面而深入的清理和总结。诗性传统,既是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根基,也是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前提。“文变染乎世情”,因“世情”之故,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大体上走了一条从政治化、哲学化到工具主义、理性主义的路径,诗性传统基本上被中断。百年回首,方知诗性传统之可贵。中国文论诗性传统在20世纪初的断裂,从一个特定的维度导致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丢失,导致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以及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疏离。要在新的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可行性路径之一是清理、总结、承续诗性传统,并揭示出这一传统的现代价值。创造性地承续已被中断近一个世纪的诗性传统,既能为联接古文论与现代文论找到一条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纽带,也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寻求传统文化的资源 and 根基。



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长青”，而在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空间却生长着葱郁茂盛的“理论”之树。晶莹的露珠还在绿叶上跳动，和煦的阳光已洒满枝叶，巨龙般的根（菱）静卧于大地厚实而温暖的怀抱，而在绿树的身边，在高天厚土之间，万斛泉源拨动着生命的竖琴……有远古时代诗性智慧的滋润，有儒道释文化诗性精神的养育，中国诗性文论的生命之树常青。



## 原始思维与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

“诗性”或“诗性智慧”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语出维柯《新科学》，特指原始人类在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等方面的特性。诗性智慧作为原始人类各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其特征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隐喻的以己度物，二是诗性逻辑的想象性类概念，三是诗性文字的以象见义、象形会意。朱光潜在评价维柯《新科学》的“历史方法”时指出：“事物的本质应从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来研究。”事物的起源决定了事物的本质，中国古代文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精神形态，但她的诗性特征却是由中国古代早期文化的诗性智慧（即原始思维）所铸成。因此，只有本源性地追寻原始思维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揭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历史成因及文化宿命，从而给诗性特征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和理论阐释。

—

中国古代文论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它的理论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3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